

走出文革

從《走出非洲》想起(校友版序)

文/葉志江

走出文革這個書名來自于一部曾讓我感動和思索的電影。卡倫·布利克森(Karen Blixen),筆名伊薩克·丹森,丹麥人,1937年發表自傳體小說《走出非洲》(Out of Africa)。1986年,由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獎。

廣袤無垠的大地,莫扎特舒緩流暢的旋律伴隨着卡倫蒼老緩慢的聲音:非洲貢嘎山(Ngong Hills)脚下,我曾經有一個農場……

她追憶逝去的歲月,不帶一絲傷感地敘述着那些曾經充滿淚水和歡笑的往事,似乎在談論他人的故事。

二十世紀初,大批歐洲移民在肯尼亞用制定法律的“文明”方式掠奪土地,就在卡倫僑居肯尼亞的

那段時間,當地便爆發過非洲人反對殖民當局的政治示威并遭到鎮壓。毋容置疑,對大多數非洲人而言,那逝去的歲月是黑暗的。或許,一本反映黑人的悲慘生活和獨立運動的小說更符合那一段歷史和馬克思的學說。但即使《走出非洲》不包含這些內容,也無損于它的藝術魅力和價值。海明威在接受諾貝爾文學獎時曾說:“如果《走出非洲》的作者,美麗的伊薩克·丹森得過此獎,我今天會更高興。”

十年文革,悲歡離合,它不僅改變了中國,也幾乎影響了每一個人的命運,但沒有悲歡離合,便沒有生命的色彩。

和卡倫所處的時代一樣,人性和愛情也是文革中的一個主題,是歷史長河中非常真實和美麗的浪花,僅僅用黑色的筆觸來描寫那個黑暗的年代是不夠的。

世紀大審判,傷痕文學,還有那些宜粗不宜細的回憶錄,文革十年的黑暗被描繪得淋漓盡致。然而,掩卷之餘,我不免會想:那在水面上閃光的浪花呢?那即使在黑暗中也不會完全地泯滅的人類的良知呢?

本書收集了近兩年我在萬象雜誌和清華校友網上發表的關於文革歲月的回憶文章和評論。這些回憶文章除了講述我個人的親身經歷,也有他人的故事。本書不是回憶錄,各篇文章皆可獨立閱讀,但在編排上以故事所發生的時間先後為序。另外,本書還收錄了幾篇涉及文革前後我的個人經歷和家史的文章,以便對我們這一代人的命運有個較全面的敘述。

我從未對文革做過深入的研究,本書收錄的評論文章,如《難言

的歷史一定有難言的故事》,祇是有感而發。這些文章可以看作書中那些“難言的故事”的一個注解,讓我的故事帶有一點歷史感。

因為所有文章都在清華校友網上發表過,本書的一個特點是收錄了相當數量的校友跟帖。這些留言或評語不僅有助於了解故事發生的時代背景和揭示若幹細節,而且曾經鼓勵和啟發了作者寫出更多的故事。書中的一些故事最初曾以《互聯網上的回憶》為名在校友和朋友圈子中流傳過,可以說,這本書是部分清華校友在互聯網上共同的回憶。



本報特約作家 葉志江

從“走出文革”所想起的

文/顧耀文

“走出非洲”,“走出文革”,就像摩西帶引以色列人“走出埃及”,都是從一段苦難的歷史裏走出來。

以“大歷史觀”看人類社會文明的發展,雖有偉人指引,強人叱咤,畢竟人少力孤,要想掀起歷史狂瀾,離不開千萬草芥小民的參與。歷史洪流是向合力方向汹涌而去的。小民的經歷是歷史的一鱗,小民的人生是文明的一瓣。一花一世界,一葉一菩提,大歷史祇是億萬民間小歷史的總和。

文革過去已有三十餘年了,三十年對人生而言幾乎是半世功業,對歷史而言却祇是“一剎那”。那是中國二千年帝制社會,由君權走向民權漫長道路中的一截,是直是彎,是進是退,都祇是一小截。

狄更斯在其名著《雙城記》裏是這樣描寫法國大革命的:

那是最好的時代,那是最糟的時代;那是智慧的年頭,那是愚昧的年頭;那是信仰的時期,那是迷茫的時期;那是希望之春,那是失望之冬;人們面前擁有一切,人們面前一無所有;人們由此奔向天堂,人們由此墮入地獄;……說它好是最高級的,說它壞也是最高級的。

寫這段話時,法國大革命已過去六十多年,狄更斯是英國作家,和法國大革命沒有恩怨糾纏。再過三十年中國人說起文革,是否也會有類似的評論呢?這要由歷史來回答。

葉志江以他靈秀的文字,幽默的筆觸,勾勒了那段歷史中個人的經歷。點點滴滴,沉沉浮浮,時而在天子脚下,政治風暴的臺風眼裏;時而山高皇帝遠,在蜀山惡水,偏僻的犄角旮旯裏。以微笑面對磨難,以調侃面對失意,以自嘲面對幸運,寫得真切誠實,使讀者感同身受,心往神馳。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極看

重“境界”二字。葉公文字,長于造境:情境,心境,意境,無不出神入化,生動有趣。而此中最要緊是個“真”字,赤子之心的真感情,方顯出人性之美。

文革是個不堪回首的年代,也是個故事迭出的年代。天下紛亂,老百姓照樣過日子,生孩子。祇要有生活,就有善和美,有生命,就有希望。即使舉國的瘋狂,也難掩人性的閃光。文革摧殘文化,也孕育文化,“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葉公筆下的文字誰說不是那個時代催生的呢?如果不去觸動那塊民族的傷疤,又怎能獲受理性的種子?

古人有言道:“才人經世,能人取世,高人出世,達人玩世”。葉公本是經世之才,可天有不測風雲,一場文革風暴,幾度角色轉換,至今終於出落成個“達人”。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將那情景歷史一段段搬演,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拿起放下,嬉笑人間,酒肉和尚,菩薩心腸。

葉公原可能成為“數學家”,“兩院院士”,“政界高官”……可造化弄人,他却修成了都市“大隱”,看透名利,穿越生死,笑傲江湖的“老頑童”。

閑話少說,且隨葉公,聽潮起潮落,看雲卷雲舒……

智者的力作

文/馬雨農

讀葉公的回憶文章,是一種享受。作為當年的清華名人,他的特殊經歷自有豐富的內涵,分享他這筆難得的個人財富,本來就興趣盎然,再加上他博學強記、貫通古今中外地娓娓道來,體味一個個不同尋常的生動故事,更是覺得視野開闊,趣味橫生。

書的題名:走出文革,品味再三,深感立意之高!不僅題文相符,貼切恰當,而且寓意深刻,令人

遐想不止。我想這大概是作者的點睛之筆,凝聚着他集多年的感悟。應該說,這并非人人都能做到的,這需要一種心態,需要一種境界。

《走出文革》,記錄了一段刻骨銘心的歷史,慶幸的是個人和國家都走出苦難:從炮打康生的政治厄運中走出,從科學館的死亡陰影中走出,從噩夢的恐怖中走出,也從僵化背時的體制中走出,從閉關鎖國的困境中走出。十年亂世,命運沉浮跌宕,感慨系之。

走出文革,難得的是走出自

我;從悲歡離合的傷痛記憶中走出,從歷史恩怨的情緒紛擾中走出,以穿透歷史的睿智,平和超俗的心態,淡定地敘說親身的經歷,“似乎在談論他人的故事”;追憶難忘的歲月,“不帶一絲傷感”,却多幾分灑脫。正因為灑脫,所以作者便有了獨到的敘事角度、方式和語境,不拘泥于具體的歷史過程,重在寫人寫事,寫真情實感。以多維的視角,多彩的筆觸,寫出了細節感人的真實故事,而且融故事性與思考性于一體,蘊含哲理,發人深省。

走出文革,更可貴的是走出禁錮:從陳規舊律中走出,從習慣定勢中走出,從時空局限中走出,真正從本質上評說文革的成因教訓、是非曲直。而且樂于擷取“歷史長河中美麗的浪花”,展示黑暗年代肆意摧殘下依然閃光的人性良知,感受種種壓制下依然頑強抗爭的人性魅力,領悟到不可泯滅的精神、不可逆轉的潮流,讓人心門洞開。走出文革,是個大命題,既不容易,但又必然。今日說來,似乎還任重道遠。走向民主,走向

復興,走向文明,走向世界,走向長治久安,走向民富國強,不都得先走出文革?

葉兄的《走出文革》,秉承清華精神——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道出了真情實理,想必定會有不同凡響的反響。他是曾經馳譽全國的紅專標兵,他的文革經歷,他的人生軌迹,當然更賦予作品有深度探究的典型意義。

智者的力作——我感受到了它的厚重分量與價值。

2010年9月15日于杭州

一籃銀元

霍金(Stephen Hawking)的學生吳忠超(右一)是我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同事,也是我多年的好友。除了探尋宇宙起源的奧秘,翻譯霍金的《時間簡史》、《果殼中的宇宙》等著作外,他和夫人杜欣欣(左一)踏遍我們居住的這個星球,沉醉在自然和歷史的時空中,炮制出一篇又一篇讓人悅目和深思的散記。

2007年底,剛出了一本新書《恒河—從今世流向來生》的杜欣欣忽然將她的目光從印度移到中國,對“志他的前世今生”發生了興趣。新年伊始,我剛從美國回來,便接受了她的一次越洋電話“採訪”。掛電話前她還未忘記給我留下 homework,要我寫一點關於我的祖輩的故事。

不久,我便收到了她的那本可愛的書。除了那些風土人情的優美描述外,書裏有不少印度眾神和因果輪回的故事。

當我回憶我的前輩和我經歷過的那些往事時,也常常會感受到一種神的力量在支配着我們這些凡人的前世今生。當然,我並不信神。我也知道,不管是東方的神還是西方的神,在霍金的無邊界宇宙模型中已無容身之處,那就在我們前世今生的故事中為袞袞諸神留下一席之地吧。

我家祖居無錫。祖父葉應春年輕時染上鴉片,不為家族所容,幾畝田地和幾間瓦房也被族中長

輩趁機奪走。無奈之中,他流落到無錫鄉下一個叫北七房的小鎮,以養蠶為生。好在學得一手燒制鴉片的絕活,鄰近的大戶人家都請他加工生鴉片。除了工錢,扣下比別人多加工出來的鴉片成了他最大的收入。日積月累,黑色的鴉片都變成了白花花銀元。

在燒制和抽鴉片交替產生的烟霧中,轉瞬間他也步入了知天命之年,但他依舊是光棍一個,沒有人肯將自己的女兒嫁給一個鴉片鬼。

因為有了錢,他不得不動起了娶老婆的念頭。

一日,風和日麗,鄉間的小河上來了一條販運日用品的小船。船家的女兒年方十七,被我祖父用五十元大洋買了下來,成了我的祖母。因為娘家姓杜,她從此有了得以傳世的名字:葉杜氏。婚後不久她便生了一個女兒。那時候并無計劃生育的限制,但此後的十多年中,我祖母不知何故再無生育。

不料,在我祖父六十三歲,已近絕望之時,祖母居然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替葉家生出了一個兒子。祖父大喜過望,有道是“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如今有了兒子,他決心痛改前非。在地上打了三天滾,不知忍受了多少痛苦,他硬是以六十多歲的高齡將鴉片戒了。兒子取名亞生,也讓我們知道了他粗通文墨。

祖父有兩個妹妹,人稱應大姐

和應二姐。這應大姐和她的男人在蘇州城裏一所師範學校旁邊開了一家賣粥的小店。我無法考證在我祖父落難的時候是否得到過他們的幫助,但下面就要說到的一件事却完全可以證明祖父十分信任這兩口子。

在生命的最後幾年中,他自覺已年老體衰,無法將兒子撫養成,但老婆太年輕,又是買來的,身後的事難以依靠她。在一個沒有月亮的黑夜,他將積蓄多年的——一籃子銀元送到了應大姐和他的男人家中,隨後又將我父親寄養到他們家,了却他縈回心頭的托孤大事。

在應大姐夫婦日後發迹時,這一籃子銀元的故事被理所當然地否定了。我們能知道的事實是,小粥鋪很快變成了正規的飯店,承包了上千個學生的伙食。數年後,兩口子又開了面粉廠、絲廠,并在無錫城裏蓋起了數十間房子,成了當地小有名氣的富人。

銀元的故事可以被否認,但我父親畢竟是他們的親侄子,這撫養的責任倒還沒有被忘掉。我父親被送到無錫城裏的學堂讀書,同我父親一起讀書的是他們的千金小姐,父親的表姐,芳名邵逸青。

多年後,邵逸青長成亭亭玉立的大小姐。因為長得漂亮,又念過洋學堂,中華書局的董事,印刷所所長王瑾士對她一見鐘情,停妻再娶。

當然,這王瑾士在上海灘也是

個了不起的角色,難怪邵大小姐會不顧父親的反對而投入王的懷抱。1917年,也就是民國六年,發生了銀行擠兌風潮,形成嚴重的經濟危機,史稱民六危機。創辦僅五年的中華書局因資金短缺幾近破產。王瑾士當時負責印刷廠,接到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大宗印刷業務,獲得厚利,解救了中華書局的經濟危機。事後,中華書局創始人陸費逵重賞王瑾士,特地購置小轎車供他每天外出聯系業務。王瑾士成了中華書局第一個坐轎車的人。

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王瑾士因為負責上海印刷廠工作而成為功臣,後來又因簽名開除香港印刷廠罷工工人一案而成為罪人。1951年共產黨肅反時,判了他無期徒刑。1958年,王瑾士死于保外就醫中。

浮舟村,無錫城外一個有三四百戶人家的村莊,距北七房街約三里地。

當我的父親依靠祖父的銀元資助在城裏的學堂讀書時,年僅九歲的母親被我的外祖父,浮舟村裏一個普通的貧農,送到玉祁鎮上一家絲廠當了童工。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小小年紀的阿英(母親的名字為諸月英)承擔起了家庭的重擔。成年後,又由父母包辦嫁給了我的父親——一個讀了四年初小,十三歲便去城裏做學徒的電工。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王瑾士

被派到香港,負責中華書局香港印刷廠的工作。我父母也先後去了香港,以避戰亂。不料,日軍偷襲珍珠港後一不做二不休,又占領了香港。此後的三年,日軍燒殺搶掠,香港遭到空前浩劫。由于糧食奇缺,香港餓死的人不計其數,運送尸體的車輛每天在街上呼嘯而過。腐爛的尸體使香港成了臭港。

母親做童工時受了不少苦。我幼年時常常摸着母親被拿摩溫(Number one,工頭)打斷的小拇指,聽她講那過去的日子。因為受過苦,母親的心腸特別好,望着滿街皮包骨的死人,她寧可自己挨餓,常將少得可憐的配給米省一點下來救濟房東太太和鄰居。

抗戰勝利後,中華書局香港印刷廠的上海籍員工紛紛坐船回家。我父母也買了船票,擇期而歸。感恩戴德的房東太太很捨不得我們離去,特意在觀世音菩薩前求了一根籤。結果觀世音菩薩和房東太太的意見完全一致,說是在香港或到了上海都太平,就是路上有危險,不能走。我母親本來就迷信,自然就打了退堂鼓。父親雖不迷信,但拗不過母親對菩薩的堅定信念,祇得將整理好的行李通通解開,又在香港住了一陣子。

果然是天意難違。我父母要乘的這條船在香港附近的公海上被日本人留下的水雷炸毀,全船數百人無一生還。(未完待續)